

第
一
编

民国名流交往集萃

主编 申晓云

结 谊 篇

陈仪与鲁迅的交往

陈仪字公洽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同乡。虽然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思想上、政治观点上难免有差距，但两人的交往却持续了30年之久。

1902年，鲁迅与陈仪先后考上了官费留学生，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陈仪进了士官学校学炮兵。两人因是同乡，又是同年到日本留学，交往自然非常密切。

从日本归来后，鲁迅与陈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鲁迅以笔为武器，唤醒民众，向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直接斗争，陈仪则走上了从军从政的道路。尽管两人的生活道路不同，但未使两人的交往中断，两人仍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如1928年2月，鲁迅以《唐宋传奇集》赠陈仪。3月，陈仪赴欧洲考察，11月回国，12月去探望鲁迅，并赠《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袖珍二卷给鲁迅。1933年8月，为营救许钦之再次被捕事，鲁迅曾致信许寿裳，打算请陈仪设法营救许钦之。

鲁迅逝世时，陈仪正在福建任省政府主席。许广平电告陈仪后，陈仪感到十分悲痛。出于对鲁迅的敬重，陈仪当即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隆重国葬，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项提议。

《鲁迅全集》出版后，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陈仪还在

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陈列在显著的地位 并不时拿出来翻阅。

(吴春国)

杨度与孙中山的永乐园誓约

杨度 1903 年赴日本东京留学，寻求挽救中国于危亡和变贫弱为富强的道路。不久，他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并在 1906 年组成“宪政公会”，鼓吹君宪救国。

当时，孙中山寓居日本横滨，正为其民主革命救国主张而积极奔走。他非常重视留日学生的宣传工作，尤其对才华横溢的杨度十分器重，曾几次劝杨度加入同盟会。但由于两人的救国主张不同，杨度没有同意。不过，杨度对孙中山也很仰慕，曾多次与孙中山讨论救国之道。

一日，杨度从东京前往横滨，与孙中山辩论中国宜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革命的问题。孙中山特意在横滨永乐园宴请杨度，两人辩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杨度拉起孙中山的手誓约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主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杨度回国后就被张之洞、袁世凯看中，进了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从事君主立宪的宣传。武昌起义后“南北和议”，杨度任北方总代表的参赞。后来，杨度又秉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意旨，成立了“筹安会”，自任会长，企图借“洪宪”帝制来实施他的君宪救国主张。袁氏倒台后，杨度作为帝制祸首，成了通缉对象。

杨度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后，思想陷入极度苦闷中，曾一度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杨度宣布“改持革命救国论”，并准备去践永乐园的誓约，跟随孙中山革命。

1922年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北伐，进军江西。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军阀吴佩孚也准备携军入赣消灭北伐军，孙中山的处境十分危急。为挽救时局，孙中山派刘成禺北上设法阻止吴佩孚出兵。刘成禺知道杨度与吴佩孚有交往，可以直接论事，即去北京找杨度。杨度当即表示：“我与先生结有誓约，予失败而先生成功，度当尽力赴之。”杨度随即出入于军阀营垒，帮助刘成禺完成了“和赣之命”，解了孙中山之围。事后，孙中山曾赞赏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之诺言。”

同年8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重返上海。就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杨度来到上海，践永乐园之约。他向孙中山承认自己先前主张的错误和失败，表示愿以劫后余生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孙中山完成民主革命，并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对杨度的诚意表示信任，欢迎他参加革命，又拟电为他作解释，证明他立场的改变，但未立即同意他加入国民党。杨度表示，即使不参加国民党，也愿跟随孙中山革命。并提出重入敌人营垒，进行“造乱”，以助孙中山反对军阀的斗争。

从此以后，杨度经常奔走于南北各地，执行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吴春国）

于右任与邵力子情同手足

于右任，陕西泾阳人，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等职，是国民党内的一位显赫人物。邵力子，字仲辉，浙江绍兴人，1949年曾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与北平谈判，被尊称为“和平老人”。他们两人最初在上海相识，由于志趣相同，便成为莫逆之交。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常常相互关心，亲密无间，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1907年邵力子去日本学习新闻学。1910年回国后，于右任介绍他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的迫害，被驱逐出境，潜回上海。1913年于右任又推荐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并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邵力子在复旦公学师生中，曾起过进步作用。如1919年的“六三”运动，邵力子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于右任因此经常称赞他。

1929年7月，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在上海与胡仁源的三女结婚，在“一品香”举行婚礼。邵力子代表亲友致词。他以通家之好，关心青年妇女前途，应以献身社会国家为重，勤勉有加，语极亲切。于右任以主人身份在致答词时向邵力子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1931年2月，邵力子和江苏宜兴的傅学文女士结婚，于右任和陈绍宽作证婚人。于右任在婚礼上称颂说：“我们都知道学文女士是大家风范，仲辉先生是江南才子，双美结合，是天赐良缘，构成佳偶。伫望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精神上互相鼓舞，这不仅是家室之福，而且是邦国之庆。”措词典雅隽永，为学者名言。

至于邵、于两家，岁时往来，更为亲密。1938年8月间武汉战局紧张，邵力子夫妇先住在汉口，10月底便飞到重庆，和于右任一

起住在重庆金融巨头康心如的家中。公余之暇，两人品茗谈心，共话抗战形势 展望和平未来 往往深夜始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邵氏夫妇在石头古城建校舍、办教育的同时 仍如既往 随时到于右任公馆 快谈竟夕 毫无倦容。他们交谊之深，于此可见。

（吴春国）

杨杏佛与茅以升的同窗情

杨杏佛 原名杨铨 江西玉山人 同盟会会员。1911年8月考取唐山路矿学堂，与茅以升同班。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但时隔两月 辛亥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 茅以升暂居上海 杨杏佛则赶赴武昌 投身革命。1912年1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杨在总统府秘书处任职，颇得孙中山赏识。在孙的鼎力支持下，杨杏佛同任鸿隽于11月赴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

茅以升在唐山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考取了清华留美预科班。1916年，公费派往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深造。在大洋彼岸，杨、茅二人再度成为校友。老友重逢 异常兴奋 两人长谈 共诉报国之志。杨杏佛侧重于社会事业，茅以升更希望学好知识，将来为祖国建设出力。当时 杨杏佛和胡明复、赵元任等人 于1915年10月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城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 茅以升是该社会员 积极为杂志撰稿。同时 茅以升、罗英等人组织了“中国工程技术协会”出版《工程》杂志 与《科学》相呼应。杨杏佛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又就读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院，并在福特汽车厂实习。茅以升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 又赴加利基工学院深造 攻读博士学位。1918年、1919年 杨、茅二人先后学成归国。杨杏佛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工科教授，闻得茅以升回国，大喜过望，向校方竭力推荐，茅以升被聘为该校工科主任。茅以升常去杨家作客，双方往来甚密。1928年 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 蔡元培任院长 杨杏佛任总干事 李四光、茅以升等二十八人当选为数理组的院士。

杨杏佛积极主张抗日，争取民主。1932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杨任总干事。国民党右派视之为眼中钉。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此时茅以升正在杭州指挥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噩耗传来，悲愤不已，立即打电报给杨杏佛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茅以升赞誉杨“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会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

（张睿开）

杨度与齐白石的莫逆交

杨度和齐白石都是湖南湘潭人，又同为国学大师王闿运的门生。杨度于绘画并不在行，但对于齐白石的艺术天才非常钦慕。他们两人所走的道路虽迥然不同，但气质是相同的，都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11年杨度担任清政府内阁学部副大臣后，总感到齐白石久居乡间，不能尽情发挥他的艺术天才，便写信邀请齐白石赴京，让他遍览北京名胜古迹。随后，杨度又资助齐白石遨游全国名山大川，以广眼界。从此，齐白石的艺术更见提高，创作了不少佳作，而杨度与齐白石的过往也更加亲密。

“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从天津回到北京，闭门读书写字，很少和外人来往；但是与齐白石的往来却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诗词和绘画艺术。

杨度善于书写汉隶大字，常为人写字。齐白石除了绘画之外，又善刻印章，他曾为杨度刻了不少刀法刚毅、灵活有力的印章，如“杨度之印”、“湘潭杨氏”、“虎头陀”、“虎禅师”等。杨度书写对联、屏条时所用的印章，绝大多数为齐白石所刻。

1928年，杨度曾为齐白石书写《湘潭齐山人生圻志铭》，内中详述了齐白石的一生，说他：

自为木工以至鬻画，曾无暇逸，亦不求人，壮老一致，自食其力。

最后，杨度又赞扬齐白石说：

凡人不能无食而生，举世方欲不劳而食，山人独以布衣终生。自劳自食，得人生之正道，可谓君子人矣。故其画与刻石，

高逸绝俗，有林下风，亦如山人之格。古称德本艺末，艺轻于德，名世宜哉。

杨度一生中在仕途上虽几度沉浮，但他却念念不忘过去的老友，与齐白石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这给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另一番情趣。

（吴春国）

弘一法师与夏丏尊的友谊

李叔同字息霜生于天津。1913年进入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与夏丏尊相识共事7年两人“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夏语）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了一本日本杂志上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列了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还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李对此很感兴趣，向夏索要杂志去仔细研读。以后两人常谈及此事均说“有机会时最好试试”。夏丏尊只是说说而已，李叔同却是当真。1917年初李避开亲朋径直前往杭州虎跑寺断食三星期自觉“脱胎换骨”。夏闻讯后大吃一惊问李何不早告知李叔同笑道：“你是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让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夏方知李已有皈依佛门之意。1918年8月李叔同在虎跑寺披剃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出家后，对夏丏尊十分感谢，认为正是夏的因缘，使他得以实现了多年神往的人生夙愿。而夏对此却颇感内疚，特意在家乡上虞建庵居“晚晴山房”供弘一居住希望能减轻弘一常年云游四方的劳顿之苦。两人始终保持着坦诚的友情。

1942年10月，弘一法师感到身体不适，自知不久圆寂，曾写好遗书一封，致夏丏尊：

丏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于 月 日迁化 曾赋二偈 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 廓尔忘言。华极春满 无心月圆。

谨达不宣

音启

这封遗书的月日 原都空着 交由弟子妙莲 待其圆寂后补填。

弘一法师圆寂后，夏丏尊把他的遗书和涅槃端相，制成锌版、铜版付印 又著《弘一法师出家》、《怀晚晴老人》等文 以作纪念。

(张 开)

孙中山与陶恩沛一笑泯怨

陶恩沛 号阴轩公 浙江绍兴人 光复会会员 以布业起家 为当地大贾 仗义疏财 喜交革命同志。经其族叔陶成章介绍 与孙中山相识 结为知己 为革命筹款 不遗余力。1912年11月 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 专程赴杭州 会见江浙实业巨子 商议筹款事宜 陶恩沛应邀前往 后同谒秋瑾墓 合影留念。时局势未定 筹款风险颇大 大多数人皆持观望态度 绍兴商人众多 唯有陶慷慨解囊 认购债券。

1916年 袁世凯倒台后 孙中山回国 再次游历江浙。在绍兴 即由陶恩沛接待。时陶 成章 案余波未息 陶恩沛心存芥蒂。双方月下对饮 陶问孙：“焕卿 陶成章字 叔为陈其美使人暗杀 今已详否？”孙中山答道：“焕卿之死 仆初闻为清廷派人南下 欲刺杀民国要员。陶质问道：“然则陈其美为清廷所派之敌间？”孙中山愕然，良久方言：“或曰英士 陈其美字 所为 仆虽讯之 未吐实。”陶恩沛义愤填膺 历数陈其美之“罪状”：“攻打上海制造局之役 其美轻敌遭擒，光复会人从厕旁救得其命。……陈其美不思报恩，既争得上海都督 又派蒋介石刺杀焕卿叔。图一己之利 而忘民国之大计 不意洪杨内讧 先见于此 遂为袁氏攫权。”孙中山默然无语。陶又说：“焕卿叔所以练兵吴淞者 为北伐耳 果欲与先生抗衡 为何坚辞浙督 不图鼎足呢？”孙连连点头称是。陶接着讲述陶成章死后 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以至清廷覆灭后，孙中山仍不得流离颠簸。一句话刺痛孙中山心坎 不禁使其黯然神伤：“仆与焕卿早年共事，……虽间有齟齬 其志则相同 绝不愿致其于死地！”陶言：“焕卿叔遇

刺 公虽电陈其美速缉凶手 但凶手东渡 光复会即星散 人知其美为先生股肱 是以疑先生。’孙长叹道：“英士虽与仆同事 易独行，易相左 果英士所为 今英士亦遭暗杀。冥冥相报 可解恨乎 此行为祭陶社 慰烈属 以盖仆之尤 请君代向族中致意。”

次日，孙中山在陶恩沛引见下，会见陶氏族人，抚恤陶成章之父 并发表演讲。当晚 陶氏族人设盛宴 款待孙中山一行。孙赞誉陶恩沛创办实业 开办公共福利 为“陶氏之佼佼者”乘兴致 泼墨挥毫 题“经纬万端”四字 赠与陶。此横幅后载于 1916 年 8 月 23 日之《民国日报》。经纬 即纱之纵横 合以成布帛 即祝愿陶氏布业兴旺之意，又含天地博大之寓意，以显陶之胸怀。

（张 睿 开）

梁漱溟父子敬慕梁启超

被人称为“现代大儒”的梁漱溟，一生最为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梁启超。尤其对梁启超，不仅在学问上，梁漱溟受其启发甚深，尊其为“恩师”，而且在修身上，也每每以梁启超为楷模，铭其重情重义，终身感念不忘。其间缘由，梁漱溟在为纪念梁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所撰写的纪念文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梁启超比梁漱溟长 20 岁，当梁漱溟还是学语小儿时，梁启超已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擘。用梁漱溟的话来说：“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代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士人、学人对梁趋之若鹜，投书、求见者甚众。梁漱溟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因多年对梁启超抱敬佩之心，梁漱溟的父亲曾两度投书梁启超，并亲往求见四次，未得一见，投书也无回文，一生引为憾事。中学时的梁漱溟受其父影响，对梁启超也极为崇敬，梁的文章几乎每文必读。其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停刊，为饱读梁书，梁漱溟除按期阅读梁主办之《国公报》、《民主报》外，还请人设法从日本购得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梁同时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这对当时内地一个寻常中学生来说，是一份了不起的丰富资财了。当然，对梁启超抱如此推崇之心的梁漱溟，是十分向往亲见梁启超的，只是不敢冒昧前往而已。